

中共海外档案珍闻

法制晚报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BEIJING COMMUNICATION RADIO

腾讯网
qq.com

海外寻档
联合报道组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共早期海外秘档珍闻

法制晚报 北京交通广播 腾讯网

海外寻档联合报道组

法制晚报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BEIJING COMMUNICATION RADIO

腾讯网
QQ.co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早期海外秘档珍闻 / 海外寻档联合报道组撰稿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011.10

ISBN 978-7-5660-0045-3

I. ①中 ... II. ①海 ...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史料
IV. ①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3246 号

中共早期海外秘档珍闻

撰 稿 海外寻档联合报道组

责任编辑 晓 默

策 划 朵生春

装帧设计 布拉格 法制晚报社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张 : 21.25

字 数 260 千字 配图 : 198 幅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045-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海外寻档之历史召唤	001
报纸上介绍档案 新尝试（章百家访谈）	002
记者带回的资料 很珍贵（杨奎松访谈）	007
7国寻档 17份希望（海外学者留言寄语）	012
★ 海外寻档之先行者说	021
逸仙真迹 昭示流亡英伦目的	022
百年旧报 孙文求助第二国际	027
笔录惊现 清廷诱捕孙中山	032
两份密笺 英友人急救孙文	037
★ 海外寻档之启蒙时刻	043
社会主义 百年前专访新发现	044
震撼清廷 邹容庭审记录披露	048
★ 海外寻档之赤旗理想	053
密信引出 “十月革命” 华工冲锋	054
讲稿见证 中文首现共产国际	059
日本发现 上海“马克思”老广告	063
粽子蘸墨 柴房译《共产党宣言》	068



CONTENTS

★海外寻档之苏俄密使 073

- 列宁特使 威廉斯基潜赴中国 074
最早密使 波波夫后人隐昌平 079
全权密使 吴廷康乔装珠宝商 084
从南向北 中国点燃革命火种 089

★海外寻档之燎原星火 095

- 骡车出北京 李大钊救走陈独秀 096
《新青年》转向 上海滩出现“共产党” 101
李大钊遗照 荷兰发现临刑绝版 106
李大钊号召 中国人首过劳动节 112
敢为天下奇 “毛奇元帅” 长沙立党 118
紧邻警察厅 武汉支部化身律所 123
接国内密信 旅日学子创“二人组” 128
警厅旧笔录 揭秘施存统遭逮捕 133
旅法书长信 蔡和森陈情毛泽东 138
化名办《赤光》 周恩来巴黎创“少共” 143

★海外寻档之走向国际 149

- 开辟“红丝路” 中共首登国际讲坛 150
俄罗斯寻到 首任团书记声明书 155
瞿秋白就义 各国共产党齐悼念 161
采访兼授课 曾是刘少奇辅导员 166



目 录

★ 海外寻档之 欧陆印记	171
访巴黎斗室 邓颖超喃喃自语	172
忆咖啡小馆 侍者资助周恩来	177
一封书信 印证最早秘密党员	182
德国大学 珍藏朱德户籍百年	187
向蔡筑同盟 毛泽东致祝贺信	192
李蔡结连理 邓小平任证婚人	196
陈毅亲笔信 牵出留法战友情	201
旅法者后裔 寄语记者觅亲人	205
最小留法生 小平轧钢工卡重现	210
最年轻少共 办《赤光》成“油印博士”	214
接替周恩来 小平组织华人示威	219
★ 海外寻档之 中国之行	227
衬衫缝密令 马林促国共合作	228
被纳粹杀害 绝笔信成传家宝	233
★ 海外寻档之 历史抉择	239
董必武纠错 “一大”会址最终复原	240
马林汇报信 佐证中共建党时间	244
陌生人闯会 马林建议迅速离开	249
南湖画舫中 中国共产党首定名	255



CONTENTS

安全局存档 神秘代表原是“特工”	261
团“一大”记录 首度发现中文原版	271
张太雷发言 先锋队易名敢死队	276
报告见真知 湖南农运扬名国际	281
32天访疾苦 走乡村开辟新天地	286
★海外寻档之红色大学	291
普希金广场 曾是少奇就读学校（东方大学）	292
哲学研究所 占据中山大学旧址（中山大学）	297
寻档大收获 找到32份中文简介（中山大学）	303
入学有特长 邓小平直进高等班（中山大学）	314
第三所红校 首次迎来中国访客（中俄党校）	319
老档案曝光 中国学生建设远东（中俄党校）	324
★★★特别鸣谢★★★	329

海外寻档 之历史召唤

时间相隔越远，历史的公正性越容易还原。

“90年前，他们去寻找救国之路；90年后，我们去寻找他们的足迹。”由法制晚报社、腾讯网和北京交通广播联合组织的“海外寻档”报道组，在权威专家带领下，从2011年2月启程，奔赴欧亚7国14座档案馆，并在国内实地调研，历时3个多月，寻回近千份珍贵档案。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先驱们多处于地下状态，国内留存档案条件自然稀缺，凡留存于海外者，更有历史价值。除这些秘档珍闻及其延伸性的生动再现之外，采访报道者们的神圣使命感和亲身经历，也同样富有感召力与开拓性，他们尤以青春热情和从未有过的宽阔视野，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红色主调上，增添了新颖的亮光。

拂去世纪的尘封，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而救国先驱们执著的探索精神，依然激励着所有追寻真理、向往光明的人们！

早年党史空白多 解码历史释疑惑
海外寻档是关键 章百家表示——

报纸上介绍档案 新尝试

“要解疑释惑，继续搜寻有关档案是关键一环。这次海外寻档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如是说。

因为关于中共早期创建史的研究有许多空白，“你们的报道选取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章百家说，“我希望这个栏目和有关的活动不仅能受到党史研究者的关注，也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极“左”思潮泛滥时期 朱毛会师曾被篡改

记者：党史研究和其他历史学科有何不同？

章百家：党史学科和其他历史学科有一点不一样，它不是由历史学家从书斋中开始的，而是直接跟党的实际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比较系统地对党的历史的梳理和总结基本是从延安开始的。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进行研究，而且提出了研究党史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研究中共党史要以研究中国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史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1951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近70页的小册子可以说是第一本权威性的党史著作，既具有政治性，也带有研究性。该书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了脉络清晰的叙述和比较完整的总结，对此后党史的宣传、教学与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泛滥，许多基本的史实都被篡改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井冈山会师，被说成是毛泽东与林彪的会师，实际上，朱毛会师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而当时朱德的扁担也被换成林彪的扁担。

鉴于这样沉痛的历史教训，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提出，要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党史公之于众。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防止阴谋家再来篡改党的历史。

党史成为学科 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记者：党史作为一个学科真正建立是什么时候？

章百家：应该说，党史作为一个学科真正建立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后的党史研究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10年里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规模的史料征集活动的开展，还有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

20世纪90年代是党史研究逐步系统化的阶段，这时党史的完整框架就基本形成了，各专题领域的研究也开始有序地进行。

新世纪的这10年，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深化阶段。表面上看，不像80年代有那么多引人注意的发现，但是这个时期里，研究更细致了，而且不同的学科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渗透非常多了。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做党史研究时，对民国史的研究还是相当差的，而新世纪的党史研究，吸收了民国史甚至国民党党史的一些研究成果，反过来，那些研究也吸收了党史研究的一些成果。

另外，传统的党史基本上只有政治史和军事史，改革开放以后，党史学家们更注意研究党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更注重党的外交政策，以及党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了。

“官修党史”与民间研究互相影响

记者：党史研究是否存在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解读，官方如何看待民间学者们撰写的党史？

章百家：我认为，党史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多样化的党史书籍的出现。有专门的党的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也有大量历

史研究者个人撰写的著作。前者常被看作是“官修党史”，后者即一般所说的“民间研究”。总的来看，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

由党史部门编写的党史基本上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方面反映的是党中央或者党对自己历史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党史学界对党史的主流认识。由专门的党史机构编写的书，主要作用是对党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作一个准确的记述，对现在的共识作一个说明。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这样一个大党来说，这是很必要的。

学者个人撰写的著作，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其实很受党史专业机构的重视。党史机构的专业杂志，刊登的大都是个人撰写的论文和文章。个人研究的成果倘若最后被确认，就会成为党史学界的主流看法，并被吸收到权威部门所写的党史中来。

研究趋于准确客观 内容参照更多情况

记者：现在的党史书对许多重要事件的记述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它有哪些主要特点？您能否举个例子？

章百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历史过程的记述要准确、客观得多，内容也丰富了很多。

举个例子，你们现在的策划主要是反映党的创建史，过去我们在讲党的创建的时候就很简单，首先就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要革命，然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基本上就是一个粗线条的概括。

那么在今天的研究里，我们便会参照更多的历史情况。首先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清末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废科举，建学堂，这就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年轻人的知识结构开始有了变化，这对中共党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中国开始出现一些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有了这种趋势才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变迁。

最后是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各种各样西方思想的流入。马列主义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它以阶级斗争为武器进行社会革命，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没有的；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理论，这是其他任何主义里更没有的；三是组织新式的革命政党。这三条同时都具备的只有马列主义，而这三条都是中国需要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革命选择马列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因。

建党历史空白仍多 海外寻档解疑释惑

记者：您如何评价我们海外寻档的这次行动？

章百家：你们的报道选取的是中共创建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党的创立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这个课题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一代又一代研究者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段历史十分复杂，要搞清楚很不容易；二是不断有新史料被挖掘出来，使研究者可以丰富和修正以前的认识。

改革开放之后，借助新公布的史料，特别是俄国所藏的共产国际档案，我们对中共创立过程的了解要比此前详细了许多，但存有的疑问仍然不少。

从思想史上来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到中国，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认识等问题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空白。

从党的组织史角度来看，共产党组织是怎么建立的，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论证。如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怎样？社会主义如何对孙中山发生了影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寻找救国道路的时候接触了哪些外国的思想？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

关于中共创建史，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有了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这种趋势，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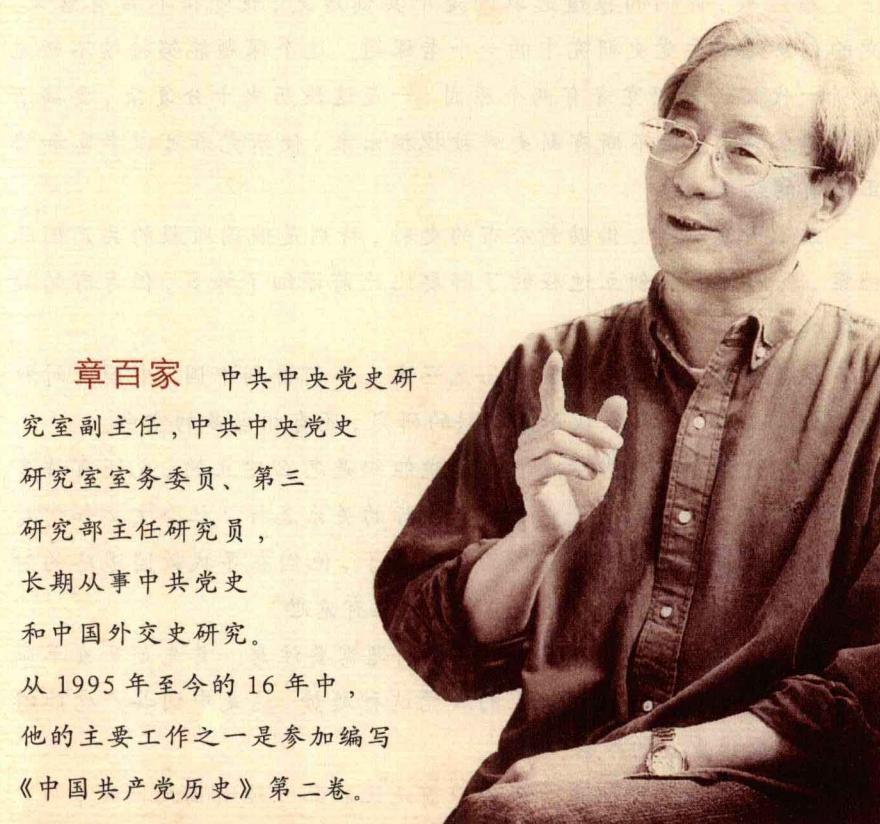
其次是跟国外的联系。我们以前是比较孤立地看国内问题，而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其实整个世界也是一片动荡，使中国整个思想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所以在看中共成立的历史时，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分析。

要解疑释惑，继续搜寻有关档案是关键一环。这次海外寻档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上介绍档案，是一个新的尝试。这使一般读者也可以体验一下历史研究的趣味和艰辛。我希望这个栏目和有关的活动不仅能受到党史研究者的关注，也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文 / 记者 林晨音 陈昆 摄影 / 记者 林晖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外交史研究。从 1995 年至今的 16 年中，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新档案佐证历史 即使困难也值得
寻档活动很可贵 杨奎松评价——

记者带回的资料 很珍贵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看来，中共建立前后，和中国有过来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去过的国家，都有存在中共建党前后的档案的可能。虽然如大海捞针，但每一个新档案的出现，都有可能成为确定某一点历史的极大佐证，即使困难，也很值得。

杨奎松说，有几个方面的资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如在法国找到的涉及邓小平等人在法国所从事的组织活动，过去还从未见到过。此外，关于中共“一大”及其筹备等会议的详细的记录资料，也十分宝贵。

早期档案散失 党史谜团较多

记者：中国共产党建立已经 90 年，但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一大’到底哪天闭幕”、“‘一大’有多少代表”等疑问仍未消除，您认为造成这些谜团的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党史研究空白多，和档案历史文献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像中共建党初期的历史，因为那段时间的档案资料最少，很多东西都散失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反映那段时间的情况，学者们到今天多半还主要是借助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来了解研究那段历史。

我们知道，回忆录或口述史料，通常有很大的缺陷，即因为历史过去太久了，人的记忆难免会有偏差，再加上人会受到后来经历以及现实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回忆起几十年前的那段事情，就会各有各的说法。不仅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而且还会弄出许多相互矛盾的信息来。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像早期中共建党的问题，今天不要说它的早期组织成立于何时、有哪些人参加，就是还有些文献资料留下来的中共“一大”时究竟有多少个党员，是53个，57个，抑或是59个，大家都莫衷一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连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有多少人，是12人，还是13人；中共“一大”召开于何时，闭幕于何时；为什么那样重要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陈独秀，包括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许多问题至今都众说纷纭。

建党重要文献 实属凤毛麟角

记者：与建党有最直接关系的研究，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像记载有关中共“一大”等历史性时刻的文献有多少？

杨奎松：目前与中共建党最直接有关的重要文献只有不多的几件，除了一般性的宣言、党纲、党章之类的资料，最有价值的有三类：

一是关于北京、广州、重庆等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报告的俄译稿，它们对这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组织经过和工作情况都有所说明，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年这些地方性组织是如何组织起来和如何开展工作的。

一是俄共及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写给所属上级的一些零星的信件。像最早在中共帮助陈独秀等在中国建党的吴廷康（编者注：受共产国际委托，于1920年来华帮助中国建党，其俄文名为魏金斯基）等人，就有几封信件保留了下来，其中具体地说明了他们是如何推动中国建党进程的。

一是中共“一大”参加者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简要说明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形，其中提到大会召开时全党有53个党员；还有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谈到中共一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其中讲述了中共“一大”开会时的党员人数，说是有“五十多”，“二大”前已达到“一百九十五人”。还特别讲到一个情况，仅“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其中共产国际协助的经费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党自己“自行募捐一千元”。

结合陈独秀 1923 年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即：“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元，其中一千六百元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可知中共早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共产国际援款来开展工作的。

但是，上述几项资料，并没有涉及早期在上海陈独秀领导的那个中共发起组织的活动情况，对中共“一大”的来龙去脉也都没有谈及。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几乎都来自莫斯科。只可惜，现在发现的资料还很有限，无助于我们准确回答上述那些问题。

解开历史谜团 必需档案支持

记者：建党初期的谜团有没有解开的可能？或者说，哪段时间的历史谜团比较容易解开？

杨奎松：长期以来，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历史情况充满了疑问却得不到破解。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真的缺少答疑解惑的条件。至少在 1927 年至 1949 年，有不少重要的历史之谜是有条件破解的。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谜团得以澄清和破解，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条件。比如江西苏区时期的富田事变，长征过程中遵义会议的内情，抗战爆发前夕国共秘密接触谈判的内幕，以及抗战期间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而与莫斯科发生分歧的原因与经过等，就是在过去这些年一一得以弄清真相的。

所以今天的人们是有可能破解这些历史谜团的，但是，这一切是有条件的，即必须是在基本的档案文献资料留存了下来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档案资料，慢慢解开中共建党的诸多谜团不是不可能的。

中共早期历史 构建成败基础

记者：到海外寻找这些老档案，有何意义？它能否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杨奎松：任何历史文献都有其价值。即使是历史上某一方所伪造的文献，也一定有其值得去研究的价值所在。

因此，有很多历史学者前往海外做资料搜集和研究，杨天石教授写过一本《海外访史录》，就全部用的是在美、日等国和地区查阅到的档案文献及图书资料，对晚清和民国的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其实，中共的历史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并左右了几乎整个中国当代的历史，要想了解中国近现代及当代的历史，就必须要有对中共的历史有真切的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

要了解中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经过了哪些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包括它所面对的主要敌人，以及它应对的策略如何，它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如何，所有这些情况其实都应该有所了解。

而中共早期的历史，事实上也构成了它后来成败的某些重要基础。能否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正确判断中共自身的发展和未来，都会有价值有意义的。

包括中共“一大”时为什么只有50多个党员？它当时成员的流动性为什么那么大？它靠什么在几年后发展到数万人？又因为什么惨遭失败？又因为什么再起再落？所有这些其实都需要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真切的解读。

海外寻档活动 收获十分宝贵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们的海外寻档活动？我们所寻回的920份档案中，有一些档案是否有价值，对研究中共创建史是否有一定的帮助？

杨奎松：作为记者，你们仅仅经过很短时间的培训、了解，然后集中一段时间去各国跑档案馆，就能发掘出这么多的新资料，还是难能可贵很值得肯定的。

从现在寻到的档案资料来看，有几个方面的资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从法国国家档案馆和外交档案馆保存的档案